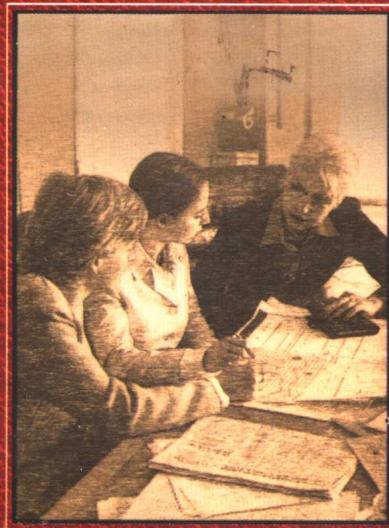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1960)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в
Китае



沈志华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 / 京 / 大 / 学 / 国 / 际 / 问 / 题 / 研 / 究 / 从 /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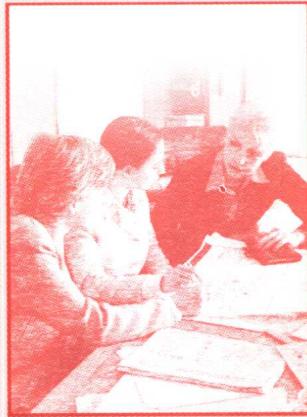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外交史丛书—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в
Китае

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1960)

沈志华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专家在中国 / 沈志华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5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 - 5078 - 2252 - 4

I . 苏... II . 沈... III. ①中苏关系—技术援助
—研究 ②中苏关系—现代—史料 IV. ①F125.551.2
②D822.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7976 号

苏联专家在中国

编著译者	沈志华
责任编辑	何清
版式设计	周迅
封面设计	耕者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53304〔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3 年 5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78 - 2252 - 4 / D · 88
定 价	26.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精心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丛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意在与时俱进，追踪新形势，探讨新课题，论述新观点，显现新特色，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因此，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既要与时俱进，更要转换脑筋。当前特别要注意三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面意见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坚持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特色。

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离不开共性，但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这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常识。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应强调国家特色。何谓特色？它指的是独特、特质、开拓创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就是突出鲜明个性，从各自角度，观察国际社会，依据与时俱进，探讨客观发展规律，说明新问题，提出新思维，得出新结论。特色是学科的灵魂。缺少灵魂的学科，毫无用处。特色总是同整体性和普遍性相联系而显现的。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不是脱离整体和普遍性而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要求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它拒绝的是教条式地全盘照搬，也反对否定一切，要求在继承和比较中创新。

国际问题作为学科研究，英、美、法三国最早，距今 83 年。特别

是美国的学科建设最为兴旺发达，仅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三次大的论战和无数次小的论战，创建了近十个主要流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在探索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新建树，但都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示了美国特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特色，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美国国情、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美国原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地球瓜分完毕，开始以强国身份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美国常强调上帝赋予的“使命感”，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美国的各学派和学者深受熏染，无不打上深深烙印，呈现鲜明的美国特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步，但作为学科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最早在中国设置国际政治专业，开始正规地、系统地培养专业人才。应该承认，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晚于美国。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国情和文化传统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曾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掠夺，被迫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经过长期奋斗，终以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演变起来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独主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传统上，是贯穿着“仁爱、和平”的“和合文化”主张的国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派和学者，应该自立于世界国际问题研究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应有自己观察世界、认识国际社会的立场和方法。

第二、弄清“权利政治”核心，从新的视角研究国际问题。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但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始



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长期以来，权力政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现象。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强权，维护人权、主权与球权，充实完善人权、主权与球权，使三权相辅相成，实现完整的统一。

权利，主要表现为人权、主权、球权，均属合理合法的权力与利益，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标志。人权是人的正当权利，主权是国家的正当权利，球权是国际社会的正当权利，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共同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

从历史渊源看，人权思想问世在先，主权法定最早，球权也因人权与主权的互动而随后登上国际舞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法定了主权又宣布了球权的诞生。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正式法定了人权与主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和约》，到《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各国的人权与主权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国内法扩大为国际法，国际社会的球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涉及领域由少到多，不断拓宽扩展，都是由主权国家在清算战争罪行的大前提下，妥协、协调，既维护主权又对等转让主权的结果。一部国际关系史，既是战争与和平史、大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关系史，也可以说是球权演变史。

球权管理的是国际事务，主权管理的是国家事务，虽然球权没有主权的权威性大，但当今世界球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且越来越大，它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

迄今为止，在球权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获取了更多利益，各国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从没有真正平等过。

但应当承认，球权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提供了维护主权，实现发展的强有力保证。虽然球权的局限性大，主要以实力为



依据。但在公认的游戏规则面前，各国平等，国际行为规范在所有国家都适用，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其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主权国家应当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行使球权，享有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利，但要加强团结，努力发展自己，既遵循球权，按球权办事，又要改革球权，使其不断充实完善，用球权维护主权和人权。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向明显，文化多样化争奇斗艳，其最大共同点是，既百花齐放，又日益走向统一。但不是统一于世界政府和霸权领导，而是统一于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之中，统一于共同的国际行为规范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主权和人权的同时，必须承认球权，把它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使主权既同人权，又同球权科学地统一起来。主权、人权、球权是紧密相联而活动于国际舞台的，既不能轻视其某一权，又不能相互割裂开来。三权的相互关系是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是重视球权的时候了。任何损害球权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就是说，必须把三权科学地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形势，研究国际问题。权利政治同强权即公理的权力政治完全不同，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新视角。

第三、抓住首要问题，科学界定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三定”：定位、定向、定标。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颇有见地。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己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问题学，或国际问题研究，就是“己学”与“彼学”的结合，更需要知己知彼。国际问题研究中为什么要知己知彼？简单地说，就是给国家定位。因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谁是敌国,谁是朋友?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战略伙伴?同谁对抗,同谁合作?必须进行科学的定位,并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相互关系。当前,必须正确判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危险,研究主要打击目标。同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相比,冷战后的霸权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同社会制度相联,作为世界敌国对待,而是属于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有霸反霸,不涉及其他,这是正确的做法。“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上升为世界公害。它与世界各国为敌,肆无忌惮地残害人类,既践踏人权,又危害主权,也无视球权,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必须有恐反恐,有霸反霸。

历史是一面镜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把全球瓜分完毕,整个世界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最终联成一体,全球范围的国际问题开始出现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国际社会舞台。迄今为止,国际问题的发展演变,均以世界经济政治为基础,紧紧围绕国家权益运转,主要表现为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动,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1)殖民主义体系形成与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2)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3)法西斯主义猖獗与反法西斯斗争时期;(4)两霸争夺与反霸权主义斗争时期;(5)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存与反恐反霸时期。从国际问题发展演变的五个时期中,我们发现有三个规律性的现象发人深思。这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际问题中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只有始终不变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战争与和平,只不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国际问题纷繁复杂,曲折常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转,表现为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些规律性现象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向”:当前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新时期影响全局的主要危险。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国

家间长期共存，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讲话在理”，说话办事要有准绳。当今世界，观察国际形势，判断国际是非，需要新的“定标”。标准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不是强权即公理，实力决定一切，名正言顺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国际事务只能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不能屈从于霸权，而应遵循球权，因为球权是以主权和人权为基础的，最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世界上的事情，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关键之处在于球权同人权、主权的统一。

国际问题研究的“定位”、“定向”、“定标”，从来就是“与时俱进”。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破旧思想、旧认识、旧判断，破落后于实际或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思想、认识和判断，又立与实际一致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与时俱进”需要转换脑筋。

现在是转换脑筋的时候了！

梁守德

2002年6月22日
于北大兰旗营小区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丛书”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 2000 年开始实施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项目的宗旨是运用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自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外交历史。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 90 年代，随着国内外有关档案的进一步开放、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和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知识的需求在 90 年代后半期明显地大幅度增长，这在许多大学的课程设置、出版界的选题和有关图书的销量等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无须否认这种需求中包含着猎奇的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毕竟长期蒙着厚重的面纱。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中国正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人不仅迫切需要了解世界，而且至少也是同样迫切



地需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曾经根据什么样的思想和以什么样的行为与世界相处。他们既需要从中得到自信，也需要汲取经验和教训。

国际社会也存在着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需求，因为它是认识中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国外学术界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即使在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的年代，那些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者仍然锲而不舍地钻研，在今天看来是少得可怜的资料的基础上，建筑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的大厦。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不乏深邃的思考和真知灼见，也有不少在我们看来是扭曲的见解、误解，甚至有不少的猜测、臆断。由于缺乏资料和必要的交流与考察，这些缺陷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不管我们如何点评，在那些国家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就是根据这些成果中的描述和阐述来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显然，如果中国学术界没有自己的力作，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本着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工作更全面发展的宗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如前所述，近10年来国内外均公布了大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有关的历史档案。不过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当事人当时的思考与活动，那些奋斗在中国外交战线的人们对自己的经历、对重大的事件、对重要的决策等等的回忆，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不可缺少的基础。这一点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我



们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历史》项目的初衷。

这个项目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所涉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包括他们的外交思想，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其二是收集和整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领导人和外交工作者们的事迹和资料，在此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中国外交口述历史资料库，以便学术界利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这个项目，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高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会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实施这个项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报《国际政治研究》已经开辟专栏，选登这个项目的一些成果。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做出新的贡献。

在此特别向积极热情地帮助和支持我们研究工作的外交界前辈们表示真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肯定是不完整的和难以深入发展的。

牛 军

2002年1月26日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逐步靠拢:斯大林时期之一

(1948 ~ 1949) (20)

- 一、战后苏联对华方针的调整 (24)
- 二、援助中共的第一批苏联专家 (31)
- 三、林彪要求苏联派遣更多的专家 (41)
- 四、斯大林的犹豫和拖延 (52)
- 五、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 (62)

第二章 缔结同盟:斯大林时期之二

(1949 ~ 1953) (76)

- 一、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 (80)
- 二、中国急需大量苏联顾问和专家 (92)
- 三、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老师 (116)
- 四、与苏联专家的矛盾和意见分歧 (141)
- 五、对苏联专家是如何派遣和管理的 (151)
- 六、毛泽东号召全面向苏联专家学习 (164)



第三章 共度蜜月：赫鲁晓夫时期之一

(1953 ~ 1957) (176)

- 一、赫鲁晓夫努力调整对华方针 (181)
- 二、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到中国 (193)
- 三、苏联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 (219)
- 四、与苏联专家的友谊和矛盾 (236)
- 五、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 (253)
- 六、派遣和聘请专家方针的微妙变化 (263)

第四章 走向分裂：赫鲁晓夫时期之二

(1958 ~ 1960) (280)

- 一、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和暗流 (282)
- 二、中苏正面冲突与专家政策的调整 (292)
- 三、苏联专家与中国的尖端武器研制 (311)
- 四、在“大跃进”浪潮中的苏联专家 (344)
- 五、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苏联专家 (371)

结 论 (404)

后 记 (418)

征引和参考书目 (421)



Contents

Prologue (1)

Chapter I Converging Gradually: The Stalin Era(1), 1948 ~ 1949 (20)

1. Postwar Readjustment of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24)
2. First Group of Soviet Experts and Assistanc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1)
3. Lin Biao's Request to the Soviet Union for More Experts (41)
4. Stalin Hesitated and Procrastinated (52)
5. Liu Shaoqi Brought Back Many Senior Experts (62)

Chapter II Alliance in the Making: The Stalin Era(2), 1949 ~ 1953 (76)

1. Negotiations over the Terms for Soviet Experts to Work in China (80)
2. China's Urgent Need for a Great Number of Soviet Advisers and Experts (92)
3. Best Teachers for the Chinese (116)



4. Contradictions and Disagreements with Soviet Experts	(141)
5. Se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viet Experts	(151)
6. Mao Zedong Called for a Comprehensive Leaning from the Soviet Experts	(164)

Chapter III Honeymoon: The Khrushchev Era(1), 1953 ~ 1957

1. Khrushchev's Effort to Readjust the China Policy	(181)
2. Soviet Experts Came to China in a Large Scale	(193)
3. Soviet Experts' Actual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219)
4. Friendship and Frictions with the Soviet Experts	(236)
5. Mao Zedong's Idea about "Using the Soviet Union as a Mirror"	(253)
6. Subtle Changes in Dispatching and Employing Experts	(263)

Chapter IV Heading toward Schism: The Khrushchev Era(2), 1958 ~ 1960

1. Tranquility and Undercurrents before the Storm	(282)
2. Face to face Conflict and Redirection of the Expert Policy	(292)
3. Soviet Experts and China's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Weapons	(311)

Contents



4. Soviet Experts amid the Tidal Wav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344)
5. Khrushchev Declared Complete Withdraw of Experts	(371)
Conclusion	(404)
Epilogue	(418)
Bibliography List of Illustrations	(421)

